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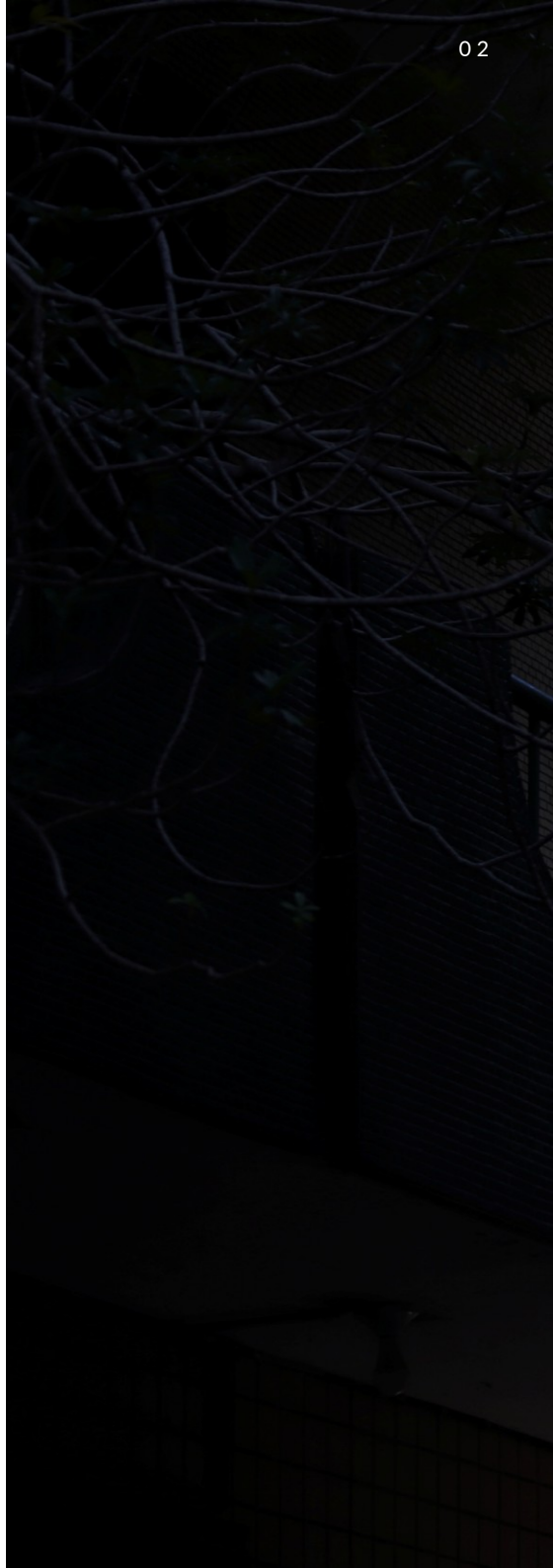
朝 南

大敘事的城南 微敘事的崁頂龍口

圖・文 黃琢允

A photograph of a building with a balcony and a tree in the foreground. The building has a brick wall and a balcony with a metal railing. A tree with green leaves is in the foreground, partially obscuring the balcony. A red lantern is hanging from the balcony. The text "你在，城南嗎？" is overlaid on the image.

你在，城南嗎？



序言 坐北朝南・無形嚮往

台北人似乎總有一種「座北朝南」的天性。這或許不只是建築學上的偏好，也不只是房地產市場裡一套關於採光、通風、風水與價格的現實語言。更深一層地說，它像是一種長久滲入日常的感官秩序，一種默默塑造我們想像世界方式的方位感。在這座位於北回歸線以北的城市裡，我們習慣將「南」理解為更溫暖的、更敞開的、更宜居的方向。陽光從南面灑落，風從南方穿堂而過，生活在朝南的屋子裡，彷彿也比較有餘裕，有喘息，有被自然溫柔接住的可能。

「於是，南方不只是地理上的方向，也逐漸成為一種情感上的方位。」

對台北人而言，往南，似乎總意味著一種離開，也意味著一種靠近。離開的是台北這座城市日益緊密的節奏、競爭的壓力、職涯導向的生存秩序；靠近的，則是另一種生活的可能。再往南一點，可以抵達新竹與苗栗，在客庄的時間感裡理解何謂樸實而深刻的地方生活；再往南一些，有丘陵、山林與海岸，像是身體終於可以重新學會呼吸；再往南，花東縱谷展開，視野被打開，腳步也被放慢；再往南，

，是台東，那種彷彿允許人暫時不必那麼用力證明自己的浪漫與鬆弛；再往南，是台南，歷史、信仰、巷弄、飲食與舊時代的肌理彼此交錯，讓人感受到文化從來不是博物館裡的標本，而是仍在生活裡發酵的氣味；再往南，是高雄，一座港都，一座仍在生成中的城市，帶著工業、海洋與轉型的氣息，向人展示未來也可以不只是一條單向度的進步敘事。

彷彿所有尚未被命名的自我，都能在南方找到某種回聲。所有對生活的猶疑，對未來的探問，對身分的重組與召喚，也都像是在南方較容易被安放。

相對而言，北方在台灣의 現代敘事裡，往往被賦予另一種意義。北方是制度的，是資源集中的，是講求效率、秩序與競爭的。北方是職涯，是履歷，是往上攀升的階梯，是一種必須持續證明自己的場域。尤其台北，作為首都，長久以來承載了太多國家機器、資本流動與成功想像的重量，以至於人們在這裡學會精準地安排時間，學會把情緒折疊起來，學會在高密度的人群中保持禮貌而疏離的距離。北方於是成了一種理性的代表，一種現代性的代表，也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生存現實。但也正因如此，南方才顯得更加迷人。它像是台北人集體心靈中的另一面：不是被管理的，而是可以鬆開的；不是被衡量的，而是可以感受的；不是只關於生產的，

而是關於如何生活的。南方不是北方的反面，而比較像是北方持續壓抑之後，心中那塊尚未完全失去溫度的地方。人們對南方的嚮往，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尋找自己內在那個還相信緩慢、相信關係、相信地方感的部分。那麼，如果我們把這樣的視角拉回台北內部來看，是否也能提出另一個問題：在這座城市之中，是否也存在一個屬於台北自己的「南方」？我自己總覺得台北城南就是這樣的一塊所在。從一個最源頭的城市一隅，轉而成為一種因硬體設施老舊而演變的都市中的邊陲。冥冥中，總是在指引一種對於台北城南的另一種凝視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如何閱讀城南？我們應該如何在城南生活？城南生活長什麼樣子？這些都是一直懸掛在心頭上的念想。

城南之所以迷人，未必只是因為它在行政區位上位於城市的南側，而是因為它承接了某種不同於信義計畫區、不同於台北車站周邊、不同於東區商業地帶的城市氣質。這裡有學校，有舊市場，有眷村遺緒，有植物園，有巷弄中的店家與長年居住的居民，也有來來去去的學生、移動中的青年，以及那些尚未被完全更新、也尚未被徹底遺忘的生活紋理。城南並不總是那麼耀眼，甚至常常顯得低調、陳舊、邊緣，然而正是在這種不那麼被高強度資本照亮的地方，城市的另一種質地反而得以保留下來。對我來說，城南是一種介於中心與邊陲之間的質地，一種尚有日常、尚有鄰里、尚有歷史殘影與未竟想像的質地。它不像人們想像中的南方那樣遼闊，

卻可能在都市縫隙之間，提供一種微型的南方經驗，重新看見地方如何透過關係被編織，如何透過記憶被感知，如何透過緩慢的交往重新生成公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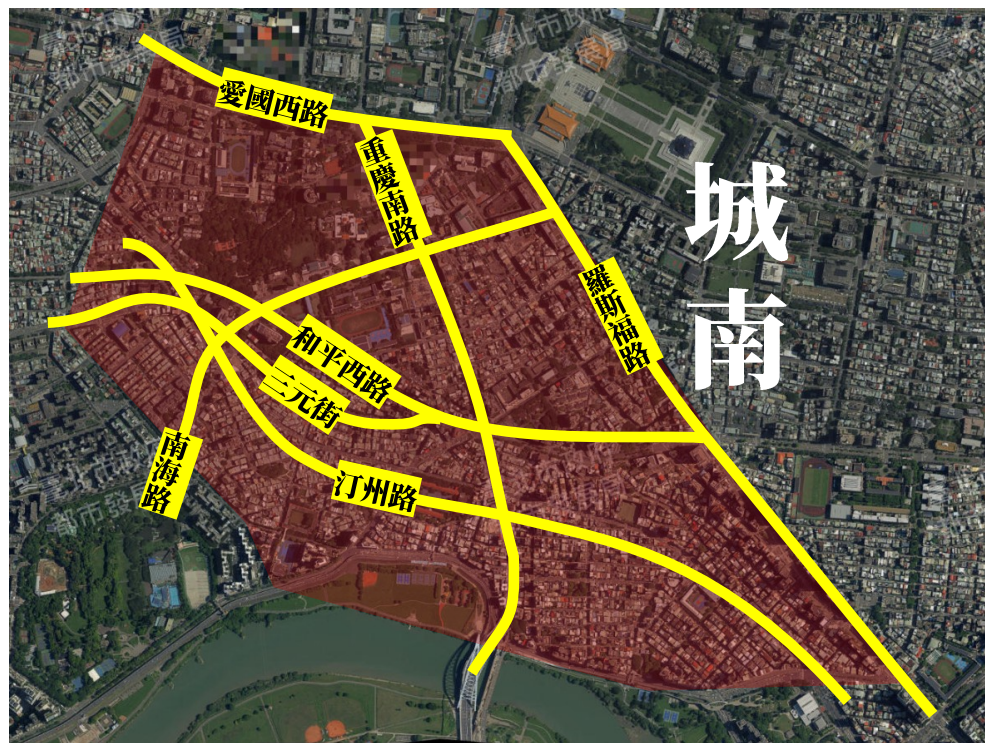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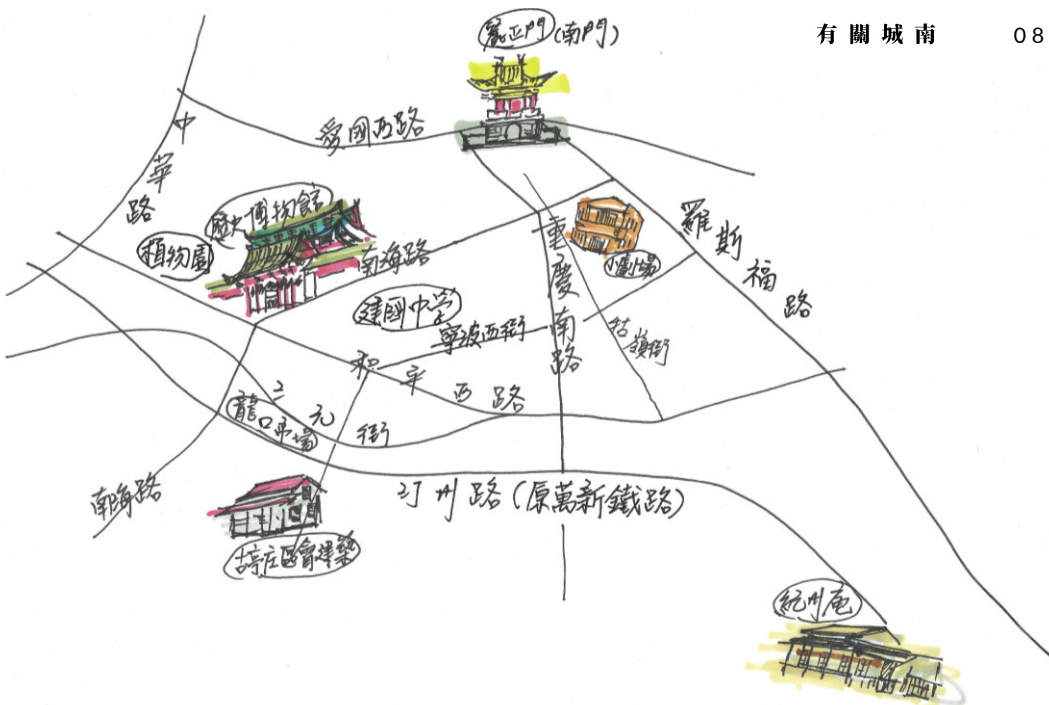
也許，台北人不是真的非得離開台北，才有可能靠近自己想像中的南方。也許，在城南，在這些看似平凡的巷口、街區、市場、校園與社區之間，我們就已經能夠觸摸到那種久違的悸動。那是一種在城市內部重新尋找可棲居之地，重新理解何謂生活，何謂地方，何謂一個人與他所在的城市之間，仍然可能存在的溫柔關係。如果說，座北朝南是一種台北人的空間願望，那麼城南，或許正是這個願望在都市內部最細緻也最值得被重新書寫的回聲。



有關城南

城外的南方叫城南

談「台北城南」，首先必須承認一件事：城南從來不是一個單純、固定、毫無爭議的地理名詞。它不是現行行政區劃中的正式名稱，也不是只要攤開地圖便能用一條線精準圈定的空間單元。城南更像是一種歷史生成的區域感，一種由都市發展、政治權力、教育機構、文化聚落與生活日常共同疊合而成的「共同體」。也因此，若要為台北城南下一個定義，不能只從行政邊界理解，而必須同時從歷史、空間與生活圈的角度來看。根據相關研究，台北城南原本泛指台北城麗正門（台北南門）南側、亦即愛國西路以南的區域；在日治時期拆除台北城牆之後，這一帶逐漸發展為新興區域，並在不同時代的都市規劃與社會遷徙中，逐步形成今日人們所熟悉的「城南」意象。





今天不去細究城南的各家定義了，普遍上來說，城南的範圍涵蓋的範圍如右圖的手繪圖。在繪製這張要表意城南的圖片時，我在下筆時猶豫許久。對我來說或許要讓人知道城南到底涵蓋了那些範圍，去標記一些城南中重要的地標才會讓人更好地理解城南究竟位於何處吧。但是心中又有一個很大的不情願在內心裡久久不能自己，且讓我細細說明，城南的張力何在。

因為城南的人文薈萃，豐富的歷史交織，使得台北諸多重要歷史建築均位於城南境內。一九零一年總督府公布「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後，城南被開闢為現代化都市計畫下的新興地區，並成為日本人居住的高級生活空間。此後，許多與殖民治理、教育制度及文化資源有關的重要設施陸續落腳於此，例如樟腦專賣局、南門國小前身的城南小學校、植物園前身的林業試驗所、建

國中學前身的臺北中學，以及北一女前身的臺北第一高女等。這使得城南自早期起，就不是單純的住宅區，而是一個與國家治理、文教系統與知識階層密切相關的都市區域。

戰後，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大量外省軍公教人口遷入，城南的社會組成與文化氣質再度轉變。原先殖民時期帶有統治秩序色彩的空間規劃，在新的政治背景下，被重新填入另一批與教育、官僚體系、知識生產有關的人群。於是，城南延續了其「人文薈萃、文史聚集」的特質，也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城市氣氛：它既接近政治中心，又不若最核心商業區那樣喧鬧；既有制度與知識的密度，又保有相對靜謐、內斂、緩慢的生活節奏。這種氣質非常關鍵，因為它使城南在台北整體城市結構中，始終維持某種介於中心與邊緣之間的獨特位置。它不是純然的商業鬧區，也不是被完全遺忘的城市邊陲，而是一塊兼具歷史厚度、文教底蘊與日常生活紋理的複合空間。

不過這次，我們不談主流的城南，只要讓你在一個宏觀的大敘事裡，讓我們談常民的城南，看他在一個市場裡的微敘事，如何與大敘事相應或脫節，此地便是龍口崁頂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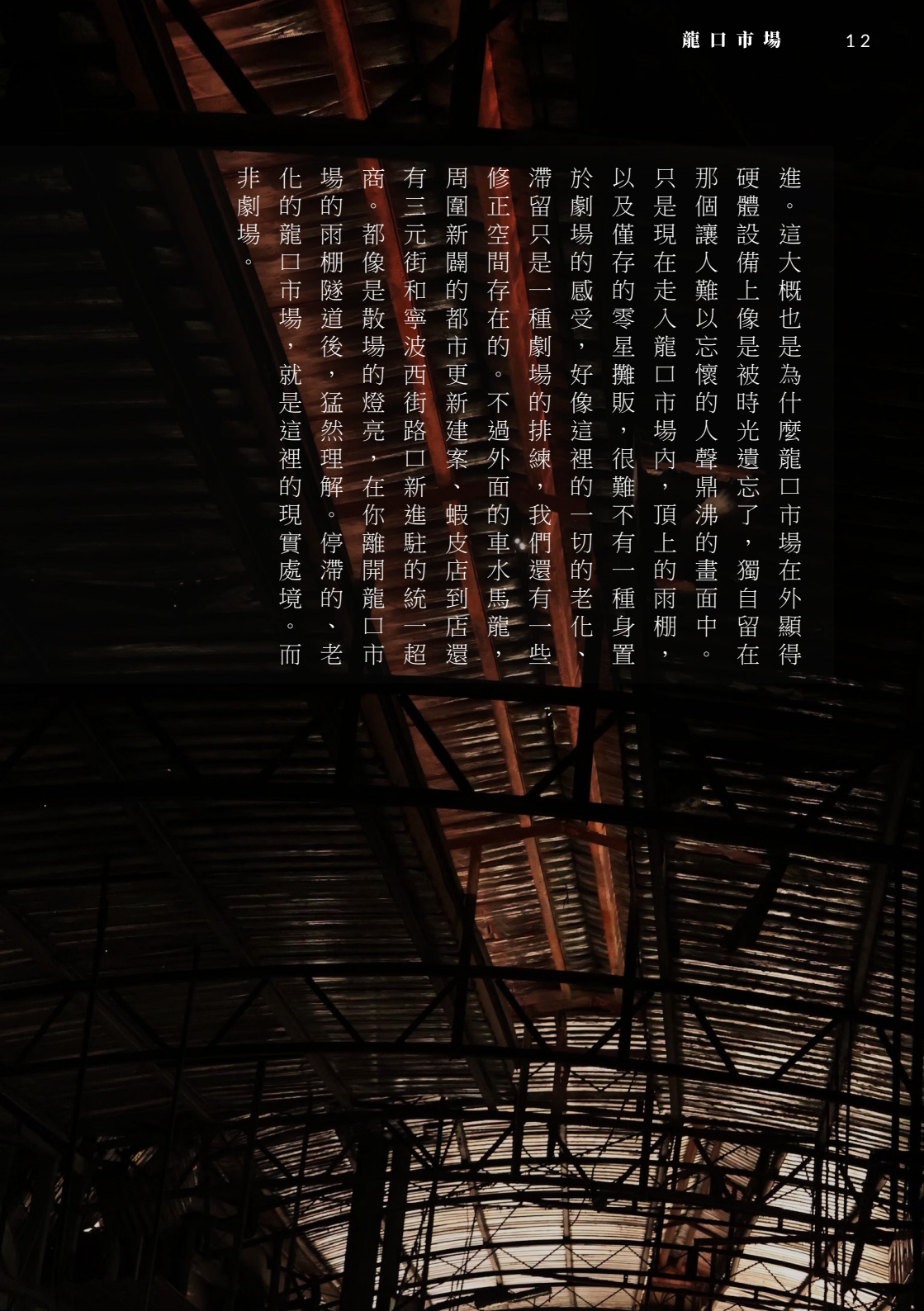
龍口市場

衰退後才可成為一種都市地景？

龍口市場位於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位於崁頂地區的核心地帶。不像是南門市場這種著名景點，龍口市場可能不是一個台北市民熟識一個傳統市場，然而在我幼時，卻是一個每到周末就會水洩不通的場所，每到傳統節慶期間，那才真正是一熱鬧的情景。在歷史發展中，因為地利之便，使得市場規模不斷擴增，從三元街一路往汀洲路延伸擴展。約莫於民國九十年代，因三元街拓寬，拆除大量原為龍口市場的棚屋、屋舍，消費者自此逐年下降，逐漸轉移至鄰近青年公園國興街的國興市場。

龍口市場因地上權複雜，又礙於市府消防與建管等法規牴觸，使得龍口市場並未由北市府市場處納管，有自治的管理單位，由後續訪談可見的管理阿姨協助推





進。這大概也是為什麼龍口市場在外顯得硬體設備上像是被時光遺忘了，獨自留在那個讓人難以忘懷的人聲鼎沸的畫面中。只是現在走入龍口市場內，頂上的雨棚，以及僅存的零星攤販，很難不有一種身置於劇場的感受，好像這裡的一切的老化、滯留只是一種劇場的排練，我們還有一些修正空間存在的。不過外面的車水馬龍，周圍新闢的都市更新建案、蝦皮店到店還有三元街和寧波西街路口新進駐的統一超商。都像散場的燈亮，在你離開龍口市場的雨棚隧道後，猛然理解。停滯的、老化的龍口市場，就是這裡的現實處境。而非劇場。



龍口市場

三坪大的前進指揮所



而如果說，龍口市場今天之所以還沒有真正從地圖與生活中消失，不只是因為這裡還有幾攤菜、幾家雜貨、幾位老主顧，那麼我想，更重要的，是因為還有人在這裡守著。

這個「守」，不是浪漫化地說有人在守護一段老台北記憶，也不是那種很適合被寫成地方創生故事的溫情敘事。

更準確地說，是有人還在持續處理龍口的日常、承接它的瑣碎、撐住它沒有完全瓦解的秩序。龍口市場的管理大姊（右圖），大概就是這樣的存在。她不是一個會把話說得很文青、很感性的人。她講話很快，很直接，甚至有一種市場裡才有的俐落與直接。她記得市場棚架大約是在民國八十七、八十八年前後搭起來的，時間點落在陳水扁擔任總統之前，那些棚子也不是哪個單位幫忙蓋的，而是攤商們自己出錢、自己分範圍、自己量位置做起來的。我們今天走進龍口市場，看到那些老舊雨棚、傾斜攤架、零星攤位，很容易直覺地把它們視為一種過時的都市殘留物，彷彿只是等待下一次整頓、下一輪拆除、下一波更新。但對她來說，那不是殘留物。那是大家自己花錢搭起來的生計基礎，是數十年來反覆修補、勉強維持、但終究真實存在過的生活條件。

管理大姊談起龍口市場的過去。

最常先說的，不是文化，也不是歷史，而是生意。

她說，從前生意非常好，好到根本沒有時間停下來聊天。清晨三、四點就得起床，先生騎著摩托車來回北農補貨兩趟，她留在攤前顧生意。那樣的日子當然辛苦，但也正因為辛苦，才讓人更清楚地感受到：那時候的龍口市場，是活的。我很在意她這樣的講法。因為它提醒我們，傳統市場從來不是先作為一種文化地景而存在。它首先是一個勞動現場。那些後來被人懷念的熱鬧、喧嘩、節慶氣氛與地方感，底下真正撐住它的，始終是清晨起身的身體、反覆補貨的腳步、顧攤的耐力，以及一筆一筆慢慢做起來的熟客與現金流。也正因如此，當她談起市場的衰退，語氣裡反而沒有太多抽象的感慨，而是一種近乎冷靜的判斷。她說，三元街拓寬之後，人沒有辦法再集中，沿街房子拆了，動線改了，後來又蓋了活動中心，市場就一年比一年差。剛開始還撐得住，大約十年前還不算太壞，但五年前開始，衰退變得明顯。

市場之所以成為市場，靠的是人流的聚集、停留與回返。一旦空間結構被打散，原本能把人留下來的條件跟著鬆動，市場就算還在，也會慢慢失去它原本的密度。

龍口市場面對的，不只是空間條件的改變，還有整個都市生活方式的轉向。管理大姊說，現在年輕人不做飯了，很多老人家也被晚輩勸著不要煮，買回家吃比較快。這句話聽起來平淡，卻幾乎點破了傳統市場近年的根本困境。市場的衰退，當然和道路、硬體、政策有關，但也和家庭裡誰還煮飯、誰還採買、誰還願意把時間留給一頓飯有關。不是市場自己突然沒落了，而是整個城市的生活，不再像從前那樣運轉。

也因此，龍口市場今日最矛盾的地方正在這裡：它一邊慢慢退出日常生活的核心，一邊又因為它的老、它的窄、它的棚架與滯留感，被鏡頭重新發現。管理大姊提到，這裡還被拿來拍電影、拍電視劇。這當然不是壞事，但也帶著一點難以言說的諷刺。

一個在現實裡逐漸被冷落的市場，卻在影像裡重新成了「有味道的地方」。好像它必須先從生活退場，才有可能成為一種可被觀看的都市地景。

二零二五年龍口市場出現了一個爭議事件，龍興里里長和市議員合作，希望推動龍口市場路面與水溝更新工程，管理大姊面對鋪路、拆攤架的爭議，她不是抽象地反對改造，也不是一味抗拒改變。她比誰都更清楚，問題真正出在哪裡。若為了把路鋪得更平、把水溝挖得更完整、把攤位排得更整齊，而必須先把整排攤架拆掉，施工五十八天，甚至兩個月，那麼市場裡的人要怎麼活？沒有做生意，租金怎麼付？客人一旦散掉，之後還回不回得來？我不由得反思，我們做為空間專業者，常常以空間的轉化過程、方式、理論來回辯證，希望實踐一個更得以共生的空間，但今日很多都市改善想像裡共同的盲點，我們太習慣從完工後的畫面理解城市，卻很少從施工期間的生計斷裂理解城市。對許多人來說，兩個月只是工程期程；但對市場攤商而言，兩個月可能就是一批熟客的流失，一筆租金的壓力，甚至是一攤生意撐不回來的開始。管理大姊的反對是一種很樸素、卻很銳利的社會直覺。

任何改善，

如果沒有先處理誰來承擔改善過程中的代價，那它就還稱不上真正的改善。

更何況，龍口市場本身就不是一塊邊界清楚、制度完整、可以被整齊納管的空間。她說，這裡的土地非常複雜，有的是仁濟的地，有的是市府財政的地，有些

有人買，有些沒有。也因此，龍口市場始終未被正式納入市場處的治理體系，不能成為一個規格完整的自治市場，只能靠協會、公會與攤商之間反覆協調，勉強維持一種還能運作的秩序。而管理大姊，就是在這樣的位置上，默默處理所有事情的人。她不是正式官員，也不是名正言順的自治會長。但會長病了之後，很多事情都落到她身上。誰來協調，誰來應對，誰來替攤商說話，最後都得回到她這裡。她身上有一種很鮮明且讓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治理氣質。

沒有太漂亮的名義，卻有極具份量的責任，
沒有正式的位置，卻得收拾最具體的麻煩。

我總覺得，管理大姊是龍口市場殘存秩序的一種人格化。她記得哪裡曾有攤架，也記得個別土地的所有人。也很清楚知道市場退無可退的戰線應該如何堅守陣地。我遠看著她，像是一個身穿圍兜的五星上將，在她菜攤三坪大的前進指揮所，市場在，人就在。

龍口市場

樓空
人不去
，
五十年



鐘阿嬤說，她在這裡賣菜賣了五十年。

五十年，幾乎不是一句年資那麼簡單。那意味著，她不是「見證」了龍口市場的變化，而是她自己的人生就嵌在這個市場的變化裡。她看過大水溝（三元街原為赤川）還在的時候，看過前面那條鐵路（萬新鐵路），看過拓寬前的三元街，也看過房子拆除、攤位消失，最後看著龍口市場從原本的人擠人，變成今日這種門可羅雀的模樣。

訪談後回看逐字稿，最先跳出來的，反而不是什麼完整的地方史，而是一段又一段被打斷的對話。你問她空間，她先回頭找客人錢；你問這裡以前是不是也有攤位，她還得先應付眼前那把菜、那一斤多少、那一袋要不要。那種時不時被打斷的敘事，反而像是龍口市場持續運作最震耳欲聾的聲響。我甚至有些暗自竊喜：最好這種中斷再多一些，最好忙到我們根本沒辦法好好採訪。大抵上，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才慢慢明白，市場，尤其是傳統市場，從來不是一個讓人完整陳述記憶的舞台。是一個不斷透過事件疊加而成的空間，也是一種在對話、詢價、找零、叫賣與等待之間，逐漸成形的地方印象。到最後，才真正領悟，市場最顯而易見的「交易」，其實只是它穿在最外面的一層衣裝。更深的地方，藏著的是時間、勞動、主顧關係，還有那種只有日復一日待在這裡的人，才能交織而成的生活節奏。

鐘阿嬤講起龍口市場的衰退，語氣其實很直接。她說，以前這一整排都是攤位，現在都被里長拆掉了。

原本有，現在沒了；

原本整排都在，現在都空了。

因為市場的衰退，很多時候不是抽象的數字下降，而是視覺上、感官上、步行路徑上的空掉。當攤位接二連三遷出，當原本應該是叫賣、堆菜、停留、討價還價的位置突然變成空地、凹陷、甚至停車空間，那種空，不只是空間上的空，也是地方感開始鬆動的空。

鐘阿公在一旁接著說，如果是二十年前來看，這裡都還是人擠人。

好像這是一種地方居民對空間變遷最直接的理解，市場不是說老就該拆、說亂就該整。它原本有自己的人流邏輯，也有自己慢慢累積起來的生活秩序。外面的人看到的也許只是棚架、菜葉、摩托車與擁擠動線，但對做生意的人來說，這些東西背後其實是如何把人留下來、如何讓主顧願意一再回來的整套條件。

當他們談到里長原本打算挖水溝、整排重做攤位、工期可能拉到三個月時，反應幾乎是一樣的：怎麼可能。鐘阿嬤說，因為大家去抗議，所以原本十二月要動的工程才先停下來，改成之後只是鋪瀝青；如果真的做三個月，他們根本沒有辦法營業。她甚至直接去和仁濟醫院那邊講，如果三個月不能做生意，那是不是就不該收租金。

今日很多城市改善的語言，都習慣先從「完成之後會更漂亮、更整齊、更安全」開始說起，可是對市場攤販而言，問題從來不是完工後長什麼樣，而是施工期間怎麼活。三個月對工程單位來說，是期程；對攤商來說，是三個月沒收入、三個月主顧可能流失。市場裡的人反對的，往往不是改善本身，而是那種從來沒有先問過誰來承擔改善成本的改善。這也是為什麼，鐘氏夫妻談起這件事時，語氣裡的火氣不是來自拒絕改變，而是來自一種很樸素的生存判斷：

你若先讓我們活不下去，再漂亮都沒有用。

而比起鋪路爭議，更讓我有感的，其實是鐘氏夫妻談到「搬市場」這件事時的反應。當我們問，會不會想搬去別的市場，比如國光市場，鐘阿嬤幾乎立刻回：

不要。因為這裡做的是主顧。搬去別的地方，沒有主顧，沒有用。

這幾句話，幾乎把傳統市場的經濟本質道盡了。對外人來說，市場好像只是攤位的集合，但對攤商來說，市場從來不是單純的地理位置，而是一整套關係網絡的累積。她們不是靠偶然經過的陌生客活著，而是靠一個又一個老主顧，靠固定送餐廳、送住家，靠幾十年慢慢做出來的信任與熟悉。也因此，市場不是說搬就能搬。

你把攤位挪過去了

不代表那些走了幾十年的腳步

那些熟門熟路的採買習慣

那些一句話就知道要留什麼菜的默契

也會一起搬過去



真正讓人鼻酸的，還不是這些空間問題，而是鍾氏夫妻怎麼看待自己的工作。他們沒有把賣菜講成什麼值得歌頌的志業，也沒有浪漫化自己在這裡待了五十年的經驗。相反地，他們幾乎是在勸我們，以後不要做這一行。鐘阿嬤說，不要讓小孩接，壓力太大，因為凌晨三點就要去補貨。鐘阿公更直接，說以後有小孩，千萬不要讓小孩做這個生意，時間長，收入少，利潤又薄，不如去上班，至少生活正常。這段話一下子就把很多人對傳統市場的溫情投射拉回現實。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什麼需要被歌頌的堅持，而是一份太累、太長工時、太沒有保障，也太不忍心交給下一代的工作。



某種程度上，我甚至覺得，這種近乎勸世的口氣，比任何關於市場沒落的分析都更能說明問題。不是年輕人願意回來，而是上一代比誰都更知道這份工作有多苦，所以從一開始就不希望年輕人回來，他們用自己熬過來的身體經驗，很誠實地替下一代劃出一條生存指引。

鐘氏夫妻身上背負的，不只是他們在這裡待了五十年的時間刻痕，而是他們自己也隱約知道，這樣的五十年，大概很難再有人接得下去。他們談日本宿舍、木板房、早年的水溝與鐵路，也談今日被拆掉的攤位、將要重鋪的道路與慢慢變少的客人。聽起來像是在講地方史，可其實說到底，那份抽象只屬於我這個未有五十年的訪客，現實是，一對夫妻被鑲嵌進城市變遷之中的一生。

後記

鐘氏夫妻之所以值得被寫下來，並不只是因為他們是市場裡最資深的攤販之一。更是因為他們讓人明白，地方從來不是靠宏大的願景留下來的。

它往往是靠這種細小、重複、甚至有些沉默的勞動，一天一天撐住。

清晨補貨、整理菜攤、招呼熟客、應付抱怨、騎車外送、晚上收攤。地方感不是空穴來風長出來的，它是被這些日常反覆做出來的。而龍口市場最讓人難過的，也正在這裡。它不是突然消失的，而是在這些仍願意勞動的人慢慢老去之後，一點點失去被接續的可能。鐘氏夫妻不是不知道這裡變了，也不是不知道這一行苦。他們甚至比任何人清楚，這種生活不該再交給下一代。可也正因如此，我們才不得不承認，當一個地方的存續，只能仰賴那些早已把一生放進去的人「維持運轉」，那麼它距離真正的退場，似乎不可避免。



龍興里

不幹里長，就不准住這裡

在龍口市場、三元街的北側，是龍興里的主要聚落所在，多數圍繞在和平西路二段七十巷的巷弄中，在三元街拓寬前，龍口市場的消費量能龐大，使得商業機會外溢到三元街北側和汀洲路二段沿線。短短不到兩百米的巷子卻有銀樓、洗衣店、寢具店、雜貨店、冰店、連江縣駐台辦事處，各種意想不到商業空間在這條巷子共創一個特殊風景。不過商店經營者也不敵歲月，一個一個逐漸繁華老去，如今僅剩雜貨店、連江縣駐台辦正常營業，一空地處已都更，其餘者均以出售易主或遷出。

很幸運的是，在一次中正區互助團在我工作室的活動中，我在地方鄰居的引薦下認識了三十年前龍興里老里長史金阿公的遺孀，李綢阿嬤。



看李綢阿嬤的言談間，絲毫沒有九十歲高齡的痕跡，你很難想像眼前這位老人竟然已經定居在崁頂地區超過一甲子。李綢原是新竹縣新豐鄉人，十七歲來到台北給人做保母，就這樣在台北結識了在後站太原路五金行做工的史金，婚後選擇定居現在和平西路二段七十巷的自建樓仔厝，並開立五金行。

我問阿嬤，當年史金阿公為什麼會出來做里長。李綢阿嬤笑著說，或許正是因為開五金行的關係，店裡日日進出，久而久之，也和街坊鄰里熟了起來。五金行不只是生意場所，也像是居民日常所需各種物資的中繼站。誰家缺了什麼、哪裡需要幫忙，大家都會想到他們。恰好那時正值選舉，里民們欣賞史金的為人，便起鬨拱他出來擔任里長。起初，史金並不同意，

認為地方上已有前輩在任，不宜貿然出線，這樣對原本的里長並不尊重。可居民的態度卻很堅決，甚至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若史金不出來選，就不准他繼續住在這裡。那樣帶著鄉里情感的「威脅」，其實也透露了居民對他的信任與期待。最終，史金才決定參選里長。

參選之後，史金也的確沒有辜負眾人的寄望。他積極處理鄰里事務，聯繫市政府前來會勘，逐步串聯起周邊既有的公車路網；也集眾人之力，募資建廟、興建里民活動中心，為地方一點一滴補上當時最需要的公共設施。今日龍興里許多看似理所當然的鄰里基礎，其實都奠基於那個年代裡，一群人憑藉關係、信任與行動慢慢推起來的地方工程。

後來，我又問李綢阿嬤，還有沒有其他她推薦的人選，可以讓我繼續採訪、繼續紀錄。李綢阿嬤幽幽地說：

沒有了啦，只剩下我了。

除了幾個搬走、去跟孩子住的以外，
其他的人，都往生了。

那句話很輕，卻也很重。

回程時，我走在巷子裡，心裡一直有一種說不出的遲來感。

總覺得自己來得太晚了。

好像有些故事，一旦發生在住宅區的常民生活裡，就注定不會被寫進歷史。

它們沒有碑文，沒有檔案，沒有誰特別替它們命名；它們只是活在一間五金行、一條巷子、一座廟、一個活動中心。

活在幾個老人仍記得、

卻也終將沉默的記憶裡。

可我不服氣。



原初聚集人的攤販
成了來往這裡的運具
擺放的
位子



孩子
還在的
成了這裡稀有的動物
原初振奮人的傳承

未完待「序」

台北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台北經驗？

我一直有個心願，
可以有一天大家不要覺得爛台北。

如果說，理解一座城市，是理解它的高樓、道路、捷運、產業與人口，那麼我們終究只理解了城市的一半。城市真正難以被言說的，往往不是它如何被建造起來，而是人如何在其中感受、聯想、停留、遷徙，又如何在不同地景之間，偷偷把自己的生命經驗安放進去。某種程度上，空間經驗的本質，從來不是空間本身，而是一種聯想的集合。我們如何理解一條街、一個市場、一片街廓，往往不只取決於它客觀上長成什麼樣子，更取決於我們過去如何生活、如何移動、如何記憶，並在經驗中逐漸學會辨認。換言之，空間從來不是中性的。它總是帶著曾經活過的痕跡，也總是召喚著還未說出口的情感。



於是，我才會不斷想到「坐北朝南」這件事。

在台北，坐北朝南首先是一種住宅方位，一種關於採光、通風、風水與價格的現實判準。但它似乎又不只如此。它像是更深地埋進了我們理解台灣的方式之中：北方，常被理解為理性、制度、競爭、職涯、效率與向上攀升；南方，則常被投射為感性、生活、緩慢、地方、鬆動與某種更接近自我的可能。於是，北方人對南方的嚮往，從來不只是旅遊偏好，也不只是地理移動，而是某種空間想像上的補償。好像我們總得往南，才能暫時從北方過度緊繃的秩序中，鬆開一點自己。

如果是這樣，那麼台北城南的意義，也許遠比它作為首都南側的一塊地理區域更複雜。

城南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曾長時間承接來自日本、中國各省乃至於台灣各地的政治移民與城鄉移民，在首都內部，逐漸生成一種帶有南方氣息（或至少是一個帶有南方想像）的生活紋理。這裡的氣味、街景、勞動、飲食、巷弄尺度與常民關係，不只是單純被「再現(Representation)」的地方性，而更像是一種在台北「北」重新長出來的南方。更接近一種「再呈現(Re-presentation)」的南方性。

城南的價值，不在於它比較舊，也不在於它比較慢，

而在於它讓我們重新看見，去形成、收斂、匯聚所謂「台北經驗」的可能性。

都市發展，從來不該只是一種由上而下、整齊明亮、無可挑剔的都會現代性。台北真正動人的地方，恰恰在那些經常被視為不夠進步、不夠體面、不夠現代的地方。那些四層樓的步登公寓、騎樓前的臨時加蓋、巷弄內的自搭棚架、菜市場的臨時電線、住宅區裡混雜著小店與雜貨舖的街廓，常常被看成是發展遲緩的證據，甚至成為與中國一線城市式更新速度對照下的「落伍」象徵。但我始終不這麼認為。

我們太容易把整齊誤認為進步，把無瑕誤認為文明，把高密度資本主導下的更新速度誤認為城市唯一正確的未來。卻忽視了，台北之所以具備今日這樣獨特的城市精神與魅力，恰恰來自常民與草根長時間的自力發展。不是因為規劃者一次到位地設計出了它，而是因為無數人在這座城市裡，透過需求、妥協、違規、修補、借用、加蓋、分租、擺攤、互助與共生，把一種由下而上的生活秩序慢慢做了出來。這些不夠整齊的痕跡，不只是城市的瑕疵，也是一座城市如何被民間共同參與生產的證明。

正因如此，我也愈來愈深刻地憂慮：當一座城市還沒有完整處理自己的社區、社群與常民歷史，便貿然推進都市更新，最終被大規模抹除的，恐怕不只是舊建物，而是人身置其中（in-place）的地方感的經驗本身。那些封閉式社區、高牆式管理、從街道抽離的塔樓型更新，表面上改善了硬體，實則很可能在隱性而大規模地撲殺地方特色，並抽空人與城市之間原本還能彼此辨認、彼此安放的可能。

我們今天所說的社區工作、社區營造，若只是節慶活動、地方導覽或表層美學的包裝，仍然遠遠不夠。它更應該是一種的實踐（emplacement），在地方仍未被完整取代之前，先行創造人能夠被城市包容、接納、共好的條件，讓社區不只是居住單元，而是一種真正讓人得以身置其中（in-place）的所在。若一個社區幾乎沒有社會性基礎設施，沒有互助系統，沒有共同體想像，沒有對地方感的集體編織，那麼都市更新一來，我們就幾乎只能被取代（replace）了。



但事情未必只能如此。若在都市更新之前，我們能夠充分建置社區鄰里的互助網絡，以軟性的、藝術性的、文化性的方式，慢慢凝聚人對社區的想像，讓地方不只是被居住，而是被共同感受、共同理解，那麼都市更新或許就不必然只是 replace。它或許可以被重新轉化成「再地方」(re-place)的過程。不是把地方清空後塞入另一種秩序，而是在硬體更新的過程中，重新安放地方既有的紋理、記憶與關係。在地方原本可能被「地方性消滅」的前景中，反而以更新為契機，重新生成一種新的地方感、新的共同體、新的空間倫理。

如果是這樣，那麼「再地方」也許不只是都市更新之後的補救工程，而應該成為都市更新本身就內含的視角與價值。不是等拆完、蓋好、交屋後才來問地方還剩下什麼，而是在更新開始之前，就先問：這裡原本怎麼生活？誰在這裡形成關係？哪些日常紋理值得被延續？哪些社會性基礎設施必須先被建立？又有哪些記憶，不該在施工圍籬拉起時一併被清除？

台北需要的，或許不是一種更像別人的台北經驗，而是一種更能理解自己如何成為台北的台北經驗。那不是對老舊的浪漫化，也不是對違建與失序的無條件頌揚，而是在承認這座城市正是由無數常民的自力發展、遷移、修補、妥協與想像共同構成之後，重新去問，什麼樣的更新，才能不背叛這座城市真正的靈魂？

而這也許正是我此刻想把這篇文章命名為「未完待『序』」的原因。因為它看似是一個結尾，卻其實更像一個開頭。它回應著最初那個關於「坐北朝南」的提問，也讓我意識到，所謂空間經驗，從來都是雙向映射的。坐北朝南也好，坐南朝北也好，它們最終指向的。或許都不是方位本身，而是我們如何在城市中尋找一種能夠安放自己、也能夠容納他人的地方性的可能。

最終我理解了，無論南方北方，方位都是我們鄉愁（nostalgia）的指向。無論南來北往，對於「景物不依舊，人事也已非」的鄉憂（solastalgia）卻是我們不共同卻能集體共情的心理衝擊。龍口市場絕非單一的淡去之處，只是時間在他身上的作用比你我，更加明顯罷了。





城南

大敘事的城南 微敘事的崁頂龍口

圖・文 黃琢允

城南生活想像基地 / 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210號之一